

湖南文史通讯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总第9期)

目 录

- 谈谈文史资料的作用.....林增平 (1)
编辑的道德修养.....吴长翼 (3)

※ ※ ※

文史工作动态

- 省政协文史办1984年征稿情况.....罗尚群 (16)
湘西自治州文史工作初步出现新局面.....州政协文史办 (17)
岳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制订一九八五年
工作规划.....市政协文委会 (18)
株洲市召开首次文史工作会议.....单先太 (16)
萍浏醴起义史料征编协作会议在萍乡市召开.....肖 彭 (19)
纪念为中美友谊作出贡献的美籍华人
——湖南知名人士发起为李国钦撰写传记.....杨文强 (20)

- 本刊专访 • 访问程博洪教授.....张海蒲 (22)

作者园地

- 史料编写的一点体会.....陈玉群 (25)
一则史料的启示.....杜衡星 (27)

经验交流

- 集体审稿办法好.....单先太 (28)
发动群众 广征博采.....茶陵县文委会 (29)

·小论坛·文史资料与博物馆事业.....吴松庚 (33)

文史资料选刊 程潜住宅被劫记.....马培芬 唐振文 (35)

周介福先生事略.....周仁济 (38)

读者来信 一种值得重视的史料.....熊杏林 (45)

简讯三则..... (24)

《衡阳文史资料》第三辑简介.....衡文 (32)

《株洲文史》第六辑出版.....丁忠仁 (34)

《邵阳文史资料》第三辑同读者见面.....肖新业 (46)

《常德市文史资料》第一辑出版.....许海晴 (46)

《醴陵文史》第一辑铅印出版.....彭克敏 (44)

《攸县文史》第一辑已出版.....陈金平 (51)

《祁阳文史资料》第一辑二月初出版.....易辉绪 (47)

《熊希龄集》即将付梓.....周秋光 (47)

《婁麓岁月》第五集出版.....黄鹤逸 (48)

诗词选登 满庭芳 五律.....徐佩 (封三)

《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征订

启事..... (封扉)

出版信息

封面题字：周谷城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编

地址：长沙市迎宾路5号

·内部刊物·

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谈谈文史资料的作用

林增平

自从一九五九年周总理号召开展文史资料的研究与撰写工作以来，文史资料工作得到很大发展。在我们湖南，虽然因十年动乱中断了十二年，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征集了三千万字的历史资料，出版了十八辑文史资料选辑，而且有好几个县市也开始陆续出版了选辑，这个工作受到了学术界和社会的重视和好评。

从文史资料工作开展以来，它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联系和争取海外侨胞，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等方面，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撰写文史资料，调动各界老年人士的积极因素，投入四化建设，这方面的成效，也是很显著的。同时，文史资料的研究、出版和发行，为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也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各界老年人士把戊戌以来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史实保存下来，加以出版，的确是很宝贵的历史资料，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继续做好这一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这里我讲一件事情来说明文史资料的作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名人，是湖南凤凰人，叫熊希龄，号秉三，人们尊称他为熊凤凰。戊戌变法时，他是维新派的先驱，当过时务学堂的监

督，也就是校长，后来搞过国会请愿，立宪运动。民国初年，他任内阁财政总长，不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一直是政界的重要人物。他对社会服务和慈善事业也很热心，创办过香山慈幼院。晚年主张抗日，对蒋介石政权不满。抗战开始后，他到了香港，后来就在那里逝世了。他有一个女儿，叫熊鼎，现居美国，已八十高龄。最近因有些业务联系，她写了一封信给我，说她看了一些国内出版的历史资料，感到祖国没有忘记她的父亲，而且有个公正的评价，因此希望把她父亲的遗骨从香港移葬香山，以资纪念。对这类事情，我们的态度是，生的回来欢迎，死的归葬也欢迎，对爱国爱乡的行为，我们都应该欢迎。所以我回信说，您的想法是爱国的表现，我们非常欣赏，并告诉她，如果需要我们代办的话，我们可以替您申请。这说明文史资料的出版发行，确实能起很大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实现了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对海外同胞有很大的感召力，使他们纷纷回国，或与国内亲友联系，象熊希龄这样一个在近代史有影响的人物从香港移葬大陆，是会产生很大反响的。由于我们公正地评价了熊希龄，他的后代就服气，感到祖国可亲，自己身在海外，也想把先人的骸骨归葬大陆。这应该说是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个生动例子。

文史工作与我的专业是非常切合的。我在大学就是读的文史系，长期担任近代史的教学，现在又担任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可以说，文史工作与我结了解之缘。今后我一定同大家一道，把湖南的文史资料工作搞好，努力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

编辑的道德修养

吴长翼

正确认识和处理编辑工作同社会的关系，是编辑道德修养的集中的体现。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编辑工作同社会的关系，首先必须明确认识编辑工作的任务和作用，这样才能够摆正文史资料编辑工作在社会上的位置，摆正文史资料编辑工作在人民政协工作中的位置，从而通过编辑工作为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根本任务服务。

人民政协编辑出版文史资料的任务和作用：既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为历史研究提供翔实的口述资料，又要坚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方向，通过出版物的传播，活跃政协工作，促进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研究历史要有个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就是资料。一切科学的结论来源于对资料的分析 and 研究。“要系统的周密的搜集资料”，“详细地占有资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对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马克思写《资本论》，为了写好二十多页的“劳工法”，读遍了凡是载有英国和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报告的蓝皮书；司马迁所以能写出《史记》，他和他父亲都在西汉王朝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搜

集资料的工作，这是个重要的条件。史料是研究历史的依据，占有和分析资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对历史研究具有印证、订正和补充的为其它资料所不能代替的作用。

一、印证的作用

我们国家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统一战线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光辉的胜利之一。政协的文史资料，有许多原工商业者撰写的实际生活经历，生动、具体地为当代中国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提供了印证。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工商业不仅外受帝国主义压迫，还内受军阀官僚的巧取豪夺。他们在帝国主义先进技术和武装面前，在军阀混战的炮火里，在官僚资本的挤压下挣扎图存。《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有一篇《裕大华企业四十年》，叙述了这一企业在辛亥革命以后从经营纺织发展到包括煤矿、金融、交通和进出口等工商业的经历。当解放前夕要在企业作出安排的时候，总经理准备到台湾设厂，运走了棉花，还要起运在国外订购的纱机；董事长也有狡兔三窟的打算。等到济南、天津解放，听到济南纱厂照常生产，看到了党的工商业政策，才决定不去台湾设厂；但是并未消释对共产党的怀疑和恐惧，于是在一九四九年把裕华、大华、大兴总公司从汉口迁到了重庆。后来人民政府将石家庄的大兴纱厂由代管改为发还，因为当时重庆还没有解放，董事长不敢同共产党发生较深的关系，只派了个副经理去办理接收。一九五一年起，实行了公私合营。这种资料，是民族工商业怎样沿着资本主义规律发展的印证；也是研究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

两面性的生动的素材。

二、订正的作用

文献资料是研究历史的根据，但不是所有的文献资料都翔实可靠，史料并不等于史实。特别是旧中国的官书、官报，往往掩盖事实真相，不足为据。国民党政府颁布过许许多多的体育法令、法规，政府的一些头头也常常到运动会上讲话，似乎很重视体育；可是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是张学良将军资助的经费，参加第十一届奥运会，是靠足球队闯江湖、挣球赛门票收入做路费的。政府根本不重视，不支持。

毛主席《沁园春·雪》一词，国内过去一些著作都说是写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到重庆谈判的时候，并据此来阐发这首词的意义；苏联汉学家艾德林也说这首词写于“一九四五年极大动荡不安的日子”。重庆市政协的同志，从毛主席的警卫员贺德华、白海山同志、秘书高治同志、清涧里老干部白焕儒同志的回忆里了解到，这首词是毛主席一九三六年率领红军东征在路上写的。主席住在清涧里苏区干部自治民家里，二月七日深夜写了这首词。当时正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季节，“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三、补充的作用

限于种种条件，文献材料对一些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往往只能记其梗概或记其结果。几十年的沧桑写到史书上，有的人物，有的事件，可能只占几行的篇幅。文史资料，例如关于辛亥革命的资料，全国政协（不包括地方政协）征集到的就有一千多万字。把武昌起义的前前后后，各个阶段，国外和国内

的各个省区、各个方面（政治、军事、外交）的资料都搜集到了。反映了错综复杂的历史实际，给文献资料作了很大的补充。

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动荡不安，有些重要史实缺乏文字记载，或者文字记录毁于战火。以红军长征为例，现有的文字材料，远远不足以反映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我们征集到几百万字的国民党将领参加围追堵截红军的回忆录，提供了为文献所无的许多史料，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怕机关遭到敌人破坏，把一些资料交给当时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拿去寄存在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后来顾顺章叛变，这人就把全部资料都烧了，烧了一天一夜。党中央一些资料都丧失了。邓大姐也说过：“你们要找我党妇女部与国民党妇女部关系的资料，因为根本没有文字记载，是找不到的。”

政协文史资料可以“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除上述作用外，还有活跃政协工作，扩大统一战线的作用。

政协的文史资料中，充满了近现代人和事的活动，同现实有密切的联系。安徽省政协发表的关于张治中、冯玉祥、方振武、戴安澜、朱蕴山的史料，两党联合举行太湖起义、吴山庙起义的史料，抗战初期动员委员会的史料，都是统一战线的实录，风雨同舟的写照。广东省政协发表关于郭典三的史料——《一门双烈，两代丰碑》：父亲郭典三辛亥革命时在潮汕参加武装起义，壮烈牺牲；女儿郭丁梅在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英勇殉难。郭典三在美国的两个孙子郭延深、郭延安看到这份史料以后来信说：“从报上我们明确无误地知道了自己的光

荣家史，感到无比自豪。今后当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四化多作努力，发扬祖上遗留的优良传统。……”

在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中，文史资料还起着旁证的作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位委员的父亲，是原国民党军官，解放后下落不明。他们的子女迫切要求知道父亲的下落。当地政府派人调查过，没有查出结果。在征集史料工作中了解到此人于解放前夕起义，不久部下“反水”，挟持他逃跑。在解放军追捕叛兵时死于乱枪之中。粤东、粤北、南路、四邑一些起义将领撰写回忆录，提供了起义时部队番号、地点、人员的材料。经过查证，为有关部门落实政策提供参考，推动了政策的执行。对于活跃政协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广泛地扩大统一战线，起着积极的作用。

湘西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有些人感到自卑。在征集史料中了解到这个地区有矿产资源，有水利资源，有舞蹈、刺绣等灿烂的文化，有建立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光荣历史，从而打掉自卑感，激发起建设热情。保靖县从史料中了解到历史上本县的大宗经济收入是桐油，县委于是作出了营造桐林、发展桐油生产的决定。

周恩来同志当年倡议人民政协组织征集文史资料这项工作，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它的社会作用是“把自己的知识经验留下来，对社会有所贡献”，“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对教育青年有好处”。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程砚秋。周总理说，他考虑这个问题是从已故的程砚秋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

程砚秋是京剧四大名旦里最年轻的一个。在旧社会经过个人奋斗，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发展了京剧表演艺术，创

造了脍炙人口的程腔，至今仍流传国内外。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敌伪统治时期，他隐居青龙桥种地。“留须罢舞称梅大，洗黛归农美玉霜”。解放后，政治上作风上也有了进步，入了党，可是总理说，这个人有些孤僻，他在旧社会是孤身奋斗出来的，养成了洁身习好的习气，不大收徒弟。他的徒弟只有赵荣琛、王吟秋等十几个人。程腔是独具风格的，难学，留下的唱片又不多，流传不广。因此，总理联想到：凡有一技之长的，总是给社会留下来好。

还有一个人叫张国淦，前清举人。做过黑龙江调查局总办、财政局会办，奕劻内阁的统计局副局长；辛亥革命以后，任国务院秘书长、铨叙局局长、教育总长、农商总长；北洋政府时期，任平政院院长、司法总长；北洋政府覆灭以后，移居天津；七七事变发生，移居上海；一九四六年任《文汇报》董事长；解放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近代史所特约研究员。一九五九年病故。这个人一生阅历丰富，政协请他写史料，写了几年，没有写出多少史料。因此联想到这种工作，如果只是个别进行，收效不大，需要有组织地进行。总理于是提出：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也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政协全国委员会随即在组织上建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样有组织有领导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口述资料，可以说是口述资料工作上的创举，世界上还没有。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工作，征集史料是工作基础，抢救史料是工作重点。邓颖超同志在人民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静的工作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这就要把征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编辑出版，向社会提供，为社会

所用，充分发挥文史资料的应有的如上所述的对历史研究起印证、订正和补充的作用，对推动有关政策的执行，促进安定团结、活跃政协工作，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起活动性的作用。也就是帮助历史见证人发表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为研究历史提供参考资料，为教育后代提供食粮，对社会有所贡献。总的说来，就是使我们的工作服从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这是一个文史资料编辑工作人员应有的自觉而清醒的道德认识。我们做编辑的就要有这样的道德认识，努力把这种认识贯穿到日常编辑工作中。

编辑人员不是政治家，但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清醒不清醒，就看我们的实际工作是不是能够体现出有利于大团结，大统一，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从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司马迁写《史记》，写《河渠书》，写《平准书》，写《货殖列传》，他就留心所处的时代，当时的形势。注意同现实结合，反映社会的经济生活，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人的活动。

提高了编辑工作同社会关系的道德认识，就会产生乐于“为人作嫁”的感情和行为。编辑工作的实质，就是以自己的劳动帮助别人发表著作（文史资料），向群众传播就是为他人作嫁。其实哪一位服装设计、制作人员不是用自己的创造给别人打扮。有人把编辑比喻为肥皂，不管是柔软的手，还是粗糙的手，同一样帮助去污。即：以自己的玉体换来别人的清洁和芳香。鲁迅、矛盾、韬奋，他们是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他们也都是编辑家。鲁迅说过：“我的生命，割碎在给别人改稿子，看稿子，编书，校字，陪坐这些事情上者，已经不少，”“我先前何尝不是出于自愿，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

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因为他认为“编辑应当有清醒的头脑，他应当是最无私的”。韬奋说他“为着做了编辑，曾经亡命过；曾经坐过牢；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属埋怨得要命，但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我们都是傻瓜，好象乐此不疲，常自动干到深夜，事情还干不完，只得恋恋不舍地和办公室告别，没有强迫或监督，不存什么奢望”。 “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到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叶圣陶先生说，“鲁翁毕生致力于编辑极勤，主旨唯在益人。”生命割碎在给别人改稿子、看稿子上，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不仅以此为快活，以此为乐，而且乐此不疲，愿为人作嫁，老死此乡。这种编辑道德行为来自哪里？来自为社会作贡献的强烈的责任感，来自“主旨唯在益人”的崇高精神。鲁迅、矛盾、韬奋、叶圣陶、巴金，都是编辑人员的榜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的工作同社会的关系，自觉地使自己的工作服从于和服务于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在我们的文史资料队伍里也不乏其人；我们应该认真向他们学习。

编辑工作者以自己的劳动帮助别人发表著作，向群众传播。这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是一项细致的工作。既要以自己的劳动帮助别人发表著作，又要从政治、思想、科学专业上把住帮助别人发表著作这个“关”。把得好，也就体现了在处理编辑工作同社会关系问题上处理得好，发挥了好的作用，产生了好影响，为研究历史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为落实有关政策提供了佐证，为教育后代提供了精神食粮，总的说来，对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反之，把得不好，就产生了相反的社会效果，产生了不好的政

治影响。浙江省政协发表的关于蒋介石母亲身世的史料，重庆市政协发表的重庆谈判的史料，安徽省政协发表的国共合作的史料，广东省政协发表的郭典三的史料，……就发挥了好的作用，产生了好影响；相反，发表了刘万春关于绥远“九一九起义”的史料，郑大纶的《陈潭秋、毛泽民烈士被蒋介石、盛世才勾结谋杀的内幕》，马子华的我所知道的卢汉，就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就没有把好这个“关”。这个“关”，具体地说就是：政治关，史实关，文字关。发表的史料，政治方面，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件精神 and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有分歧；史实方面的人物，地点，时间，重要情节，引文不准确；文字方面不通顺，有歧义；这些关口，编辑就要把住，不能放它过关。

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是比较复杂的。纵向地看：上下虽然只有七十年，但是这七十年间，是我们国家处于空前巨变的时代，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编辑工作中要经过制订选题计划，审读、加工，以至看校样，看清样，同作者、读者联系等等一系列的过程。横向地看，又有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种各样的门类：烈士血染龙华的历史，有企业家破产的纪录，有奥林匹克的往事，有末代皇帝的宫廷生活，有谈判桌上的斗争，有战场上的决战，……这就要求编辑工作者不能不虚心求教，努力学习，向书本学，向老编辑学，向老校对学，向作者学，向读者学。且学且做，且做且学。学做一个杂家。眼界要开阔，知识要广博。否则，对党的政策精神理解得不深，对专业对信息了解得不熟，看资料困难就多，选题标准就掌握不稳，

要把“关”就不一定把得住。政治方面、史实方面发生问题的教训已经不少，文字方面也还要注意。我们的资料是“文史资料”；“文史”的含义，《论语·雍也》上说：“文胜质则史”意思是文采胜于质朴，是史官的一个重要条件。政协文史资料“文”不是指文物、文献、文学，它们之间有联系，但又有区别。文物、文献不属于我们征集的范围。“文史”的“文”也不修饰“史”，不是说史料要有文学色彩。政协的“文”，我的理解即以言记史。“言”包括语言和文字，即以语言文字记述史实。不过，文史一家是我国史学的传统，文字流畅、生动是史料传播的重要手段。前四史（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的作者都具有文才史笔。写后汉史书的作者很多，而流传下来却只有范曄的《后汉书》。就因为范曄写的《后汉书》文笔生动，“以意为主，以文传意”，既是史书，又有文采。毛泽东同志说：《后汉书》写得较好，值得看看。特别指出《李固传》、《黄琼传》很好。言而无文，行之不远。隋朝王劭修的《齐志》，质朴无文，因而失传。我们不要求史料有文学色彩，但写得既有史料，文字又畅达，优美，当然更好。袁世海的《我的舞台生活》，廖辅叔的《千古文章未尽才》，傅仪的《我的前半生》，沈醉的《我这三十年》，文字就都很美，使人读来感到亲切、生动、实在。编辑人员虽不是作家，但文笔晓畅，也是编辑的不可少的一个条件。编辑不能把原材料汇集在一起，就算完成了任务，还要加工润色。韬奋说：“做编辑的人好象是读者所用的厨子。”这句话，既表达了对编辑道德的认识：“为读者所用”，又说明了编辑工作的特点：是厨师。厨师用原材料做出可口的菜，献出物质食粮；编辑用原材料做出有价值的可读的出版物，献出精神食粮。因此对材料不仅要求认真选择，还要求精心加

工，这就要求编辑不仅要有自觉而清醒的编辑道德认识。还要具有较高的文字水平，才能发现文理、文字上的问题，进行加工。而精心加工的目的，是为读者着想，对读者负责，这也是编辑道德认识和道德感情的具体体现。

编辑工作同社会的关系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对社会作贡献。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以自己的劳动帮助别人发表著作，向广大读者输送，从而在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活跃人民政协的工作，研究历史，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它自己的作用。因此，编者同读者的关系，编者同作者的关系，基本的一条是为作者服务，为读者服务，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这是编辑道德的重要的体现。

从对作者方面说，要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一是要认真审读，不能轻易放过。有的史料，撰述者不是名人，但他却是一次重大事件的见证人；有的史料，从全篇看不可取，但是其中有一小部份或者有几行字的内容，却有参考价值；有的史料，瑕瑜互见，内容不错，问题也不少；这就需要编辑有强烈的责任感，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以对作者负责的态度去认真审读，或是沙里淘金，或者加工制作，尽可能做到发现和保留可用之材。所谓“文责自负”，目的是促进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而不是减轻编辑职守的责任。凡是属于《选题和加工》中提到的五个方面的问题，都要经过认真处理；然后输送给读者。二是要及时处理，做到随到随看。用与不用要告诉作者，开诚相见。必须防止积压稿件甚至丢失稿件的事情发生。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热忱地为作者服务，对作者负责。

从对读者方面说，就是要给读者输送有益精神食粮，也就是鲁迅反复强调的“使读者有所得”，“于读者有益”。就我们

的文史资料说，就是要把周恩来同志提出的“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对教育青年有好处”的史料输送给读者。

在旧中国，有些地方是不能悬挂中国国旗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就是一个。一九二五年帝国主义制造了“五卅”惨案，中国的师生集会抗议，第一次在校园是升起了中国国旗。可是美国藉的校长一见，马上当众把我国国旗扯了下来，踩在脚下。一批中国师生激于爱国义愤，辞职、退学、组织起来，创办了光华大学，意思是光复中华。二十四年以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生，在当年美国校长扯下中国国旗的校园里升起了五星红旗。当年被迫离校的老校友，倚着旗杆痛哭失声，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旧中国，我们连在自己国土上升旗的权利都没有。而今天，我们的五星红旗升在天安门上空，升在联合国大厦门前，升在世界性运动会的大厅里。这是多么得来不易的珍贵的权利啊，中华儿女哪一个不为此而感到自豪。

我们有责任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国歌歌词，产生于中华民族遭受外敌入侵苦难深重的岁月。“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那深沉有力的呼声，呼唤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走上抗日的战场；今天炮火消失了，硝烟消失了，但是“起来！”的呼声，依然可以激起我们的斗志，呼唤我们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前进！”去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

如果我们的编辑，以自己的劳动帮助作者发表这类的史料，向广大读者输送这类的史料，生动而具体地介绍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知识，让年轻一代知道我们是怎样遭受帝国主义蹂躏和奋起反抗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真正属于我们的新中国的，从而热爱我们伟大的党，热爱先辈经过千辛万苦才找到的社会主义，热爱前程远大的新中国。头脑明智，精神

振奋，一代追踪一代投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洪流之中。那就“于读者有益”，“对研究历史有帮助”，“对教育青年有好处”，对促进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有积极作用。那也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了编辑工作同社会的关系，体现了头脑清醒的编辑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

体现对作者和读者负责、为作者和读者服务的编辑道德行为，一是提高出版物质量；把关把得牢；选题选得准；取材取得精；经过润饰，文字晓畅，可读性强。我们说的“可读性”，是指有史料价值，于人有益，文字生动，而不是去迎合猎奇，迎合刺激。韬奋在三十年代初做编辑工作，就力避当时“鸳鸯蝴蝶派”的颓废作风，努力于出版引人向上的精神食粮。二是加强同作者、读者的联系：韬奋接办《生活》周刊的时候，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人：徐伯昕管营业，孙梦旦管会计，韬奋管编辑。《生活》每年要收到三万多封来信，他们“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韬奋说：“当时我们答复读者来信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这是我国编辑历史上的光芒四射的优良传统，每一个编辑都应该认真学习，努力发扬。编辑人员除了要有自己的文史资料卡片外，还要制订一套作者、读者姓名，地址的卡片，以便于经常进行工作的联系，感情上的交流。

编辑人员需要练笔，需要练习写作的基本功，但是练笔的目的是为了运笔，为了做好编辑工作，提高编辑质量，注意不要摆错了本人写作同本职工作的关系。如果编辑人员由于从事本人写作而玩忽编辑的职守，那是本末倒置。至于利用自己工作上的条件，窃取作者的劳动成果，那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同编辑道德绝不相容，是必须纠正的不正之风。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